

# 纪念麦克法夸尔老师

徐轶青

周一下午，收到好友牛津大学商学院教授 Marc Szepan 的邮件。他的邮件很简短：“轶青，我想你一切都好，猪年快乐。如果你还没听说的话，我想和你分享这则令人悲伤的消息。Rod 去世了。”邮件后面附上费正清研究中心关于麦克法夸尔老师离世的消息。我很难过。今年给 UCSD 的本科讲《中国政治》课，开题就是讲到 Rod 对我个人的影响。他于 2012 荣休、之后到中国演讲仿佛还是近在眼前的事，现在他却离我们而去了。

麦克法夸尔教授有一个中文名，马若德，国内的朋友多用这个名字称呼他。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（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），认识他的同事和研究生则亲切地直呼他的大名 Rod。在我心里，更习惯的称呼是麦克法夸尔教授，因为我最早“认识”他，是通过他和费正清主编的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。我记得那一套书是我本科时从复旦后门的鹿鸣书店“天价”购得的。麦克法夸尔教授在文革刚刚开始 60 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文革起源（后来的材料证明，他的推断是非常准确的）。当时在我一个本科生的心目中，麦克法夸尔教授是那种难以企及的学术偶像。

想不到，几年后的 2010 年，我被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的博士项目录取。那年 9 月，我来到麻省剑桥。开学前，我被告知可以选修哈佛研究生院开设的几乎所有的课程（这两所学校教学资源共享的程度极高，选课极自由）。在哈佛大学政府系的课程列表里，赫然列了麦克法夸尔老师的一门课——Gov2284 Chinese Authors on Chinese Politics。我简直高兴坏了。我拿着选课单去我的学术导师 Lily Tsai 签字。我记得很清楚，Lily 说，“你确定要选这门课吗？这可是一门历史课，和你的学术背景差别很大。”“是的。但是能上他的课是我的梦想。再说，我听说他明年就要退休了。”我坚持要选。“好吧，只要你想好了，我支持你。”Lily 答应了。

Gov2284 是我在美国上的第一门与中国相关的课。我选这门课的原因，一部分是出于追星，出于对学术偶像的崇拜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门课覆盖的内容（从五马进京到十七大的共和国史）是我知识结构中的盲点。第一天上课，CGIS 北楼底楼 Fung Library 对面一间小教室坐得满满的。课程的要求很高，开课 12 周，每周大约要读 250 页的中英文材料——这门课要求同学同时熟练掌握中文和英文——每次课前，有一组同学要就阅读材料做一个 20 分钟左右的演讲，期末再写一篇学期论文 25 页左右的学期论文。第一堂课，Rod 还请了南希（Nancy Hearst）女士向我们介绍 Fung Library 里关于中国精英政治的素材。南希女士长期帮助麦克法夸尔教授搜集资料，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学者或者与哈佛燕京、费正清中心有一些关联的人，大约都得到过她的帮助。我们这些经常在环境宜人的 Fung Library 自习的学生，也对她很有感情。

Rod 开宗明义：“这门课是开给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，主要的形式是你们问问题，我来解答，然后我们一起讨论——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要读的材料很多，不过是我发现，一般来说，中国同学只读中文材料，美国同学只读英文材料。”说完大家都笑了。第二节课，教室就

只剩下 16 位同学。每个人都能坐得舒舒服服地，但是也因为选课人数急剧下降，每个人被分到了两个小组演讲题目。我被分到的题目是“沈志华——整风运动”和“毛毛（邓榕）——文革终结”。也因为班级人数少，后来我和几位同学（如 Marc Szepan、还是本科生的 Shao Heng 和后在纽约工作欧阳斌）成了好朋友，一直保持着联系。

Lily 的担心是对的，这门课与我熟悉的经济学的教学方式很不同，我遇到了很大的挑战。当时看这些历史材料，我感觉是在听故事，但很难摸索到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——比如，Rod 注意到，在高饶案前毛就已经对刘产生不满，因为他特别关心文革的起源问题；但我当时则完全不知道这些细节的意义。因此，在智识上，这门课并不是我在剑桥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门课。但是情感上，这门课对我的冲击非常大。一部分是我急于改变对自己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的无知的情况，另一部分是受到 Rod 的人格魅力的感染。

中期的时候，Rod 要求我们每个人提交一份论文的材料索引。当时我想写改革开放初期的分权，并列出了二十几篇我熟悉的经济学文献。一周之后，我拿到 Rod 批改的作业，上面赫然写了一句话，This is a horrible source paper（这是一份差得要命的材料索引）。我虽然觉得看清了他的评语，但仍一时不敢相信，便跑去问他。他的英国绅士的方式把这句话又念了一遍，然后告诉说，在我的素材里，没有看到任何一丁点关于历史细节的一手材料。他鼓励我改作一个更小的题目，并多引用一手材料。最后，我写了一篇关于万里八九年前后角色的文章，拿到一个 A-。与 horrible 相比，算很大的进步了。我已经不记得 Rod 给我的评语了，应该是简短的鼓励的话。但是我记得清楚，他在我的小论文上仔细编辑了英语用词法和语法，有一句评论我记得很清楚：The footnote sign should come after the comma（脚注符号应该在逗号之后），我受用至今。

结课以后，Rod 请我们十几个人到哈佛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饭。去的路上，欧阳斌陪着他买了两瓶红酒。十几个人拼了一张长桌。那家餐饮叫 Zoe's，虽经历了一次火灾，据说现在仍然生意兴隆。

这门课结课以后，我每学期都会找 Rod 单独聊一次。他的办公室在 CGIS 南楼的一楼。进入他的办公室，最醒目的是李锐先生送给他的一幅字：“年老更当攻读时，富于阅历善于思”等等。每次谈起与那些“两头真”的中共老干部的私人友情，Rod 喜悦的神情溢于言表。我已经记不太清当年问他的那些问题了。很可惜，我并没有把课程以外的谈话记录保留下来，应该一部分关于中国未来的走向（他常说，我是历史学家，可是人们喜欢问我未来会怎么样），另一部分是关于自己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。

然而，我记得有两个话题是反复出现的，一是他中国人因文革而丧失文化认同（identity）的担心——因为认同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纽带，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基础；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认同只剩下民族主义，是很危险的。另一个话题是上层既得利益阻碍改革。Rod 相信，在经历外部和内部的大动乱之后，中国最后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，赢得全世界的尊重，这种尊重最终将来源于国家领导人与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，并须以制度化的方式体现出来。与其他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样，Rod 的中国政治的理解不是非黑即白的，他认为政治制度的改善是一个谱系，渐近的改革是可能的。但是最近几年，他觉得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。

还有一次，我和当时还是独立撰稿人的四鸽去采访他。四鸽当时的英语口语一般，所以拉上我作为后备翻译。四鸽是极好的记者，采访前向 Rod 发去详细的采访提纲。谁知我们刚到，Rod 就说，“你的那些问题很好，我已经答好了。粗体的部分是我的回答。谢谢你们过来，现在我们可以聊其他问题。”在这次采访里，Rod 谈到了文革再次发生的可能。他说：再次发生是可能的，但不会简单的重复，因为上一次太可怕了，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。但是正是这种灾难，使改革成为可能。“没有文革，就没有改革”是他在多个场合提到过的命题。那次采访结束的时候，四鸽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，这是我和麦克法夸尔老师唯一的一张合影。